

沃爾夫雖然在行文中對前人所謂「沒有歷史的人民」的斷想做了糾正，但是他並沒有讓應該發言的、在他看來「有歷史的人民」發聲。這一點或許就是歷史人類學研究者所應該注意的不足之處。

但是沃爾夫在把分析工具的焦距拉長之後，我們看到在現代世界體系下，這種關係不僅是存在於一個制度內的矛盾關係，而且在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超越我們所謂的矛盾關係——一種焦灼的互惠互利的關係，儘管矛盾無處不在，這是其一。其二是關係從階級之間擴展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現在還形成了不分國家集團式的經濟壟斷，超越了國家、民族。這種現象馬克思是始料未及的，但是當

前的確存在，因為國家的界線不再像1960至70年代那樣涇渭分明。

從今天的眼光分析該書，沃爾夫的研究有一點缺陷需要指出來。他雖然在行文中對前人所謂「沒有歷史的人民」的斷想做了糾正，但是他並沒有讓應該發言的、在他看來「有歷史的人民」發聲。這一點或許就是歷史人類學研究者所應該注意的不足之處。我們不僅僅要看制度、看外力作用，還要看主體參與者的人的能動性之發揮。這樣，那些有歷史的人民的「心聲」才能得以表達。

巨人與矮人的語言鬥爭

● 陳祥波



李銳：《無風之樹——行走的群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作者李銳談到《無風之樹——行走的群山》（以下簡稱《無風之樹》，引用只註頁碼）時曾說：「《無風之樹》寫了三個月，是我下筆最快的一部作品，講的就是文革，把文革寫成一個寓言，一場巨人與矮人的故事。歷史總是巨人們高高在上地指導矮人們的歷史，可又總是給矮人們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張婷：〈「文革」是我終身要表達的命題〉，《鳳凰周刊》，2006年第35期，頁72-73）。借用作者的這個說法，我們可以把《無風之樹》整個文本的語言分成兩個系統：一是矮人坪的矮人（老百姓）語言，這個語言系統主要表現為真切表達了生活現實的日常口語，特點是其原生性；一是劉主任（劉長勝）和苦根

(趙衛國)的巨人(官方)語言，這個語言系統主要表現為完全悖離生活現實的意識形態話語，特點是其異域性。在文本裏，作為權力根源的國家機器只是作為背景裏的陰影存在，巨人對矮人的統治體現為話語統治。

這部解析文革時期中國社會真實生態的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兩種語言系統之間的統治與反抗。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 巨人語言對矮人語言的統治

在矮人坪這個封閉世界裏，統治的權力卻是來自外面的世界，權力的代言人是劉主任和苦根。劉主任和苦根之所以在矮人眼裏是巨人，一則是因為他們代表的國家機器具有不可挑戰的權力，二則是因為矮人語言不能夠從話語上理性分析和批判巨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在矮人世界裏，拐叔(曹永福)完全不能理解巨人語言，結果被壓迫致死；生產隊長天柱一定程度上洞悉巨人語言的奧秘，還準備利用巨人語言從劉主任那裏奪回暖玉；暖玉也不能理解巨人語言，但她洞悉巨人本身的人性特點，所以她能夠用建立在健全的常識理性基礎上的矮人語言，正面反抗巨人語言，形成一定層次上的價值批判和解構。

書中第二節劉主任見到拐叔的時候說：「曹永福，我這回是來清理階級隊伍來了……哈哈，曹永福，矮人坪要是沒有你這麼個富農份子，這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啥的

還真沒法子搞啦你」(頁9)，這些意識形態話語馬上就建立起了劉主任對拐叔的宰制。整個文本的敘事關節在拐叔不堪壓迫上吊自盡，此後的敘事都是圍繞拐叔的喪事為中心展開。對拐叔的致命壓迫同樣來自意識形態話語，儘管拐叔事實上只是一個給生產隊養了一輩子牲口的孤寡老人，但卻被「富農」這樣一個詞語牽扯進了掩蓋在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話語下的權力鬥爭和女人爭奪，終至喪命。

意識形態話語不僅構建起巨人對矮人的統治，而且巨人之間的權力鬥爭也是在意識形態話語下完成的。苦根抓住劉主任的致命傷：暖玉和階級敵人富農份子拐叔有男女關係，劉主任和暖玉也有男女關係，按照苦根的意識形態話語表述就是：「有些同志喪失了階級立場，在作風問題上和階級敵人混在一起」(頁43)，結局是苦根告倒了劉主任。這個時候，劉主任自己也變成了意識形態話語宰制的對象：「我離個婚、結個婚，這就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啦。」(頁197)作者在這裏深刻地揭示出：擁有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人就是巨人，失去了這個話語權就馬上變成矮人。

巨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和矮人的生活現實呈現完全的悖離狀態，這在苦根身上得到集中表現。如果說劉主任因為好色還有一點人性的話，苦根則完全是個政治機器、意識形態怪物。他所有的生命存在都是由意識形態話語構建的：名字叫趙衛國，在有記事能力的六歲時，「那時候他還不知道甚麼叫命苦，他只知道去朝鮮當志願軍的爸爸叫美國鬼子打死了」(頁56)；十三歲

借用作者的說法，我們可以把《無風之樹》整個文本的語言分成兩個系統：一是矮人坪的矮人(老百姓)語言，一是劉主任和苦根的巨人(官方)語言。巨人對矮人的統治體現為話語統治。

苦根的人物形象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正是其理想主義的真誠凸顯了苦根所蘊含的悲劇性：意識形態構建起來的理想主義使人變成了非人，變成了沒有人性的政治機器，既毀滅了自己也毀滅了別人。

時，他對學校校長和老師說：「我爸是烈士。我爸死了，我現在就是黨的兒子，我當然聽黨的話，黨就是我爸。」(頁57) 苦根甚至用意識形態話語構建了犧牲生命的神聖性：「我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為人民而死，……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是黨的，是革命的，是毛主席的，是我爸的。」(頁153) 所以他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情感和價值判斷：拐叔自殺身亡，連矮人坪最愚昧無知的糊米和醜娃媳婦都感到不平和悲傷，但他的反應是：「我真是沒想到咱們村的階級鬥爭會這麼複雜，太複雜了！」(頁120)

苦根的人物形象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之所以主動申請到矮人坪工作，是受到周立波的小說《山鄉巨變》的影響，要替他爸來「改天換地」。他有一整套的計劃，理想遠大，胸懷高遠，而且還腳踏實地付諸實踐，為此他簡直做到了鞠躬盡瘁的地步。暖玉評價苦根說，他「特別真，真得天底下難找第二個」(頁26)。正是這種理想主義的真誠凸顯了這個人物所蘊含的悲劇性：意識形態構建起來的理想主義使人變成了非人，變成了沒有人性的政治機器，既毀滅了自己也毀滅了別人。

二 矮人語言對巨人語言的反抗

矮人語言對巨人語言的反抗分三種形式：(一)矮人語言與巨人語言的不對接；(二)矮人語言解構巨人語言；(三)矮人話語自成一體的價值自圓性。

不對接指的是意識形態話語和生活現實連接不上造成的理解誤區。如書中第七節：「我說，苦根兒，我不知道甚麼叫影響，也不知道你的那本色是紅的還是綠的。我就知道我們一家人活活的快要餓死了，我就知道矮人坪的人救了我們一家人。」(頁27) 又如第二十三節：「這個階級到底是個啥東西呀，啊？也不知道是方的呀還是圓的？」(頁80) 不對接造成的是表面的、直觀的、不自覺的反抗，不構成重大的價值威脅。

重要的是第二種形式的反抗，它直接針對巨人語言，並含有矮人獨立的、自圓性的價值觀念。這種反抗的代表人物有兩個，一個是拐叔，他用結束生命的方式解構了意識形態話語：「我倒要看看，我沒有了，他們還咋清理，咋整頓？我倒要看看他們的那隊伍和階級怎麼辦？都放到哪兒去？留着餵狗吃？要不放到缸裏腌起來？」(頁80) 拐叔的反抗表達了矮人的價值觀念：「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欺負暖玉，欺負一個女人家算是啥東西呀。再說暖玉那女人這一輩子夠個淒惶了，我不能和你們一塊兒欺負她。」(頁68)

另一個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暖玉，這個人物是全書最健康、最溫暖的形象。暖玉的各種觀念都來源於普通的人生常識，也就是說，她是一個常識理性健全的人。她並不只是反抗巨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凡是一切違反人情的話語她都反抗。第五節說到，她的孩子小翠死了：「婆姨們說，按這的規矩小娃娃死了不能埋，得撂到山上野坡裏去，要是埋了，死孩子就能成了精，就

要回來再拉別的孩子走。我就放下針線拿起菜刀，我說，你們這群龜孫子都給我出去吧你們，我可不是你們這的人，我才不管你們這的龜孫子規矩。」(頁21)

只是因為意識形態話語完全悖離、同時又統治了生活現實，使得暖玉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反抗最為強烈。有以下幾個場面集中表現了暖玉的反抗精神：其一，苦根第一次找暖玉談話要她注意影響的時候，「我一把就把衣服拽開了，我把兩個奶子堵到他臉跟前，我說，你少和我說這一套酸話，你是不是嫌自己沒佔上便宜呀你？」(頁20)其二，開會批鬥拐叔的時候，暖玉在眾目睽睽之下給階級敵人拐叔遞水喝。按照劉主任的話語說：「這女人，真他媽×一點階級立場也不講」(頁53)。其三，暖玉給拐叔祭奠餃子。「苦根兒又指着炕頭說，暖玉，你搞的這一套都是封建迷信，都是唯心主義！暖玉說，我們老百姓才不管迷信不迷信呢。死了人，不供獻供獻那成了啥啦？我不懂得你的那主義是個啥東西，反正做人得做得有良心，做人做得沒有良心了，那不成了畜生啦，啊？」(頁155)

暖玉的話語都是從生活現實生發出來的，具有原生性，集中地表達出矮人的生命感受和觀念，對意識形態話語構成了一定層次上的話語批判和解構。解構和批判來自兩個層次：一是她對操持意識形態話語的巨人本身的人性了解，所以劉主任在暖玉面前感到統治的無力，苦根不敢正視暖玉的眼睛；二是她的矮人話語具備獨立而穩固的價值觀念，從觀念上根本性地擊潰了意識形態話語的權威基礎。

第三種反抗形式正是矮人話語的價值獨立性，即價值自圓性。如果說暖玉的話語是一種正面反抗，所有矮人的生活現實則構成了一種價值自圓性，從側面自動消解了巨人語言的統治。這種價值自圓性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性愛觀念的自圓性：最突出表現在暖玉和矮人坪所有單身漢的性關係上。當初是矮人坪集體出錢替其中一人娶(其實是購買)暖玉，當這種共生性愛受到巨人語言的攻擊之時，暖玉用一種最原始的方式(把奶子堵到苦根臉跟前)，把巨人打得落花流水。

二、善惡觀念的自圓性：拐叔被巨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定義為「富農」、「階級敵人」，但是沒有一個矮人把拐叔視為惡人，相反都同情他，為他的死所震驚和傷心，最後集體為這個孤寡老人舉行了喪禮，這是矮人反抗巨人的一次集體行為，顯示了矮人社會在最基本的道德問題上其價值觀念的獨立性和穩固性。

三、生死觀念的自圓性：包括暖玉在內的矮人都相信人死之後有靈魂，這是一種非常樸素的觀念。它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其實這是中國人普遍的一種文化心態。馮友蘭先生對此分析得很透徹：「喪禮、祭禮的意義都完全是詩的，而不是宗教的」，「我們從詩中得到情感的滿足而並不防礙理智的進步」(馮友蘭著，涂又光譯：《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32-33)。按照暖玉的說法是個良心問題。所以，儘管巨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已經把拐叔的死定義為「富農份子曹永福畏罪自殺」，是

最具有反抗精神的暖玉，是全書最健康、最溫暖的形象。暖玉的各種觀念都來源於普通的人生常識，也就是說，她是一個常識理性健全的人。她並不只是反抗巨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凡是一切違反人情的話語她都反抗。

暖玉的話語都從生活現實生發出來，具有原生性，集中地表達出矮人的生命感受和觀念，對意識形態話語構成了一定層次上的話語批判和解構。

階級鬥爭的複雜化，並拒絕滿足拐叔遺願，批評暖玉為階級敵人做壽衣、供奉，儘管有這一系列的意識形態話語的阻礙，但是矮人仍然按照自己的信念，完成了一個完整的喪禮儀式。

矮人(草根)社會的價值自圓性對巨人(官方)統治的側面消解，顯示了作者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這個現象構成了在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事實：基於最基本的生存現實構建起的草根社會的自圓性價值體系，使任何來自於官方的、學術的價值系統的統治流於形式和表面，除非改變這種價值

體系賴以存在的基本生存現實，否則很難改變這種自圓性價值。

本文從語言的角度解讀了《無風之樹》，正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說：「因為語言的命運根植於一個民族對存在的關聯中，所以，在我們看來，追問存在的問題與追問語言的問題在最深處交織。」(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5) 正是在語言中，《無風之樹》對中華民族的存在作出了極具深度的追問和思考。

財稅變遷、鄉土重解與一個鄉鎮的三十年

● 龐 溟



田毅、趙旭：《他鄉之稅：一個鄉鎮的三十年，一個國家的「隱秘」財政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每個人都見證着自己的歷史，但並非每個人都書寫自己的歷史。早在百年之前，梁啟超已經指出歷史「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西方國家最興盛的是「民史」，而中國歷代的史書「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梁啟超：〈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59-